

“后浪”与文学的抵达之谜

在一度引发聚讼不已的巨大争论的视频《后浪》中，“前浪”为青年一代或者“后浪”们准备了一次声情并茂的赞美、“献媚”的表演，没成想，却行变成了一场罕见的舆论的大型翻车现场。“前浪”们措手不及，难道赞美年轻人、鼓吹青春也有错吗？按照以往的话语逻辑和意识形态，你几乎没有理由否定这篇精心策划、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青春宣言。“你们是最好看的风景”“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是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然而，这些语重心长、“爹味十足”的心灵鸡汤暴露了“前浪”们的傲慢，哪怕这种傲慢以一副谦和、慈祥的面孔出现。清醒的“后浪”们认为，这“本质上是资本与父权一次合作——它向年轻人献媚，本质是向消费主义献媚，它致敬年轻人，本质上维护和致敬的是‘前浪’们掌舵的时代”（曾于里）……“前浪”们还没弄清楚，他们在权力的让渡和传承关系中伸出的那双温暖的右手，握住的不是“后浪”们的右手，而是自己的“左手”；“后浪”们并不需要成为“前浪”的“后浪”，他们只需要独立定义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今天我们就与青年作家周恺聊一聊他们眼中的“前浪”和作为“后浪”的“他们”。

对话

反驳，当时好像是聊到怎么摆脱虚无，一开始觉得文学始终被虚无限制着，是因为文学是由“一定是这样吗？”开始的，它既不是阐释，也不是否定，它是对确定性的质疑，是对边界的质疑。但后来细想，又觉得文学可能从虚无开始，但它并不被虚无限制，就拿加缪的《局外人》来说，它的发端是对存在的质疑，但行进过程中，它靠的不是缜密的逻辑分析，而是一个接一个的灵感，凭空出现的灵感，这就是奇迹，文学被奇迹限制着，在哲学与历史一次次被终结后，它却延续了下来，靠的就是这个。

何同彬：你觉得你“成名”了吗？或者说这些纷至沓来、“可有可无”的声名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体检时心电图的异常曾经让你产生死亡的“紧迫感”，作为一个90后写作者，有没有恐惧于自己可以预知的未来？

周恺：没有，我倒是想，有声名是好事，至少可以带来些便利，那些所谓的声名的困扰跟日常生活中诸多的琐碎的麻烦比较起来，不值一提，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已经很难再单纯靠写作成名了，大众的焦点早已转到了影视和网络。我其实还是挺庸俗的，从来没有恐惧过那些可以预知的东西，对我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按部就班，我恐惧的是不可预知的部分。

■题外话

周恺：我记得最早认识你，你好像还在南大教书，后来就去了《钟山》，我既不了解大学，也不了解杂志，只是每次碰到的时候，别人都会说这选择挺奇葩的，你是怎么想的？跟你在一组笔记里提到的“文学生活”有没有关系？顺便解释下什么叫“文学生活”吧。

何同彬：这是我第1571次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确很多人认为我离开大学是脑子被门挤了，我的官方回答是：大学压力太大，我想活得轻松点。很多人习惯于天天在网上批判、羞辱大学，却对一个人选择离开大学表示费解，这里面的逻辑很好玩儿。我曾经用波德莱尔一个特别文艺腔的问答粉饰自己这个“逃兵”的行径：“人生是一座医院，每个病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这一位愿意面对着火炉呻吟，那一位认为在窗边会治好他的病。”我从大学到了杂志社还是（更像）一个病人，更多的人从别的似乎低一等的职业、身份涌入大学就不再是病人了？把大学、大学老师想象得更“好”是非常市俗的表现，但我离开大学不是我不得志，是因为我做不好。我把波德莱尔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改掉几个字用以回答你后面的问题：“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你还在这里！”什么是“文学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其实我没有很好地回答你的问题，有很多东西对于“前浪”来说是难以启齿、无法表达的。



何同彬

青年评论家，《钟山》杂志副主编。现代快报《读品周刊》“读家对谈”栏目嘉宾主持。



周恺

1990年出生于四川乐山，作品多见于《天南》《山花》《青年作家》《作品》《芙蓉》等杂志。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苔》。

至2010年前后，你都能看到一套隐形的民间秩序存在，各个维度都有，而现在这些秩序正逐步消失，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秩序越来越强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更自私，我们更愿意依附于秩序，并嘲弄秩序。你之前引用过一个90后作家的话，“你们鼓励我们写不一样的东西，写更当代的题材，我们写了，你们又不发，而那些发表的、得奖的全都是老的东西，陈旧的东西。为什么？”然后你说你无言以对，却颇为喜悦。我明白你喜悦什么，我也明白这个90后作家在说什么，他无意于去改变什么，他期望你们来改变。我身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我们都认识的大头马、陈志伟还有黎么，这个名单可以拉很长，当然也包括我，秩序收割我们了吗，我觉得没有，我们有没有依附于秩序，我觉得有，将来秩序会不会反噬我们，说不定，这就是前提，不是信心的前提，是无奈的前提，在这个无奈的前提下，姿态就尤为可贵，消极的抵抗的姿态，当然，我很希望我的观察是错的。

70后、80后作家和50后60后作家其实是同一代人

何同彬：“前浪”阎连科老师说：“今天这个时代给70后80后作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白期，是他们一鸣惊人最好的时候，只要谁能写出和50后60后作家同水准的作品，那就把所有的作家都盖过去了。”这让我想起你在《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中，回忆自己的一篇小说里借诗人之口说21世纪的小说应该是雨果、福楼拜、托马斯·曼、马克·吐温、福克纳、马尔克斯、昆德拉、村上春树、萨尔曼·拉什迪、赫塔·米勒……的反义词，是沈从文、鲁迅、莫言、阎连科、苏童、王安忆……的反义词，接着你说，“如果彼时彼刻，我知道自己后来会写《苔》，我想，我会觑着脸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你的意思是不是《苔》的写作延续了某种传统，使你的写作没能成为“反义词”？那是不是就落入了前面阎连科所预想的后辈写作者所谓的“一鸣惊人”的套路？

周恺：我去搜了下阎老师那段话，后面还有一句“就像乔伊斯把托尔斯泰那页掀了过去样”。问题是乔伊斯写《尤利西斯》，肯定是在拿托尔斯泰那种史诗式的作品在做参照，以反经典的形式构建起新的经典，不光乔伊斯是这样，二十世纪绝大多数作家都是这样，但70后80后作家是不是愿意拿50后

60后作家的作品做参照？我感觉，他们不屑于这么干，他们的脐带不是连在中国的50后60后作家这儿，而是直接连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卡佛、波拉尼奥那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跟50后60后作家其实是同一代人，至于是不是能“一鸣惊人”，并非“水准”就能决定，里头还掺杂了很多别的因素，单说水准的话，70后里头，盛可以早期的几部长篇，阿乙的一些短篇，80后里头，东北的那几个作家，水准肯定是不比50后60后差的。阎老师前阵子跟我们上课说的另外一段话，我觉得更意思些，原话我记不住了，大概就是，他们这一代的作家，其实都是用20世纪的技巧，讲19世纪的故事，如果讲套路，我觉得这个叫套路，从这个角度说，《苔》肯定是循着这个套路来的，但我想说的“反义词”不是这个意思。那段话是我写的一个短篇里头的，那小说没发表过，写的是一个诗人伪装成刺青师，把作品刺到人身上，唯有所有的人皮凑到一起，才可以看到作品的全貌，它隐藏了我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作品、载体和读者的关系，一个是书写有没有可能是纯粹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指向21世纪文学的。

文学可能从虚无开始，但并不被虚无限制

何同彬：你在跟余幼幼她们的对谈中说老一辈作家老是拿经验说事，借此对年轻写作者实施“降维打击”，可他们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饥饿和波折”，但还是“写成一坨狗屎”。什么特点和品质的作品在你看来是“一坨狗屎”？

周恺：“狗屎”说得太过了。这么说吧，他们的作品跟他们的经历不匹配。最典型的就是路遥，前阵子，我找了些他个人的材料来看，包括他“文革”时期的表现以及几部作品中的原型，这些背景远比他的小说更精彩，甚至有些研究者的论文都比原著精彩，作者大于作品，这就有问题了，说明作品的经典化是被别的东西给拔上去的。

何同彬：你说，文学是属于“上帝”的时代，它赖以生存的点就在于奇迹，在于一些字、一些词、一些句子、一些人物、一些情节凭空冒出来，它甚至连“虚无”都不可能抵达，更不用说去抵达比“虚无”更深的东西。又说，“要想真正从虚无出走，去触碰、构建或者看见自身”只能离开文学。再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两句话。

周恺：前一句是对后一句的

B站的用户特别擅长消遣和解构严肃的话题

何同彬：B站的《后浪》有没有看过？有何感想？或者说谈谈你眼中的“前浪”们。

周恺：看过，我没觉得有那么严肃，又是资本，又是父权的，我就把它当一条广告看，我不知道这条广告有没有别的地方给钱了，如果有，应该是有人被糊弄了。何老师经常上B站吗？

何同彬：App我下了，上得不多，看看视频还行，融入不了它携带的那种文化，包括社交方式，很多术语、英文缩写看不懂，还要去网上搜索什么意思。

周恺：就我的感觉，那上头的用户不正经的应该比正经的要多，他们特别擅长消遣和解构严肃的话题，别说这样的“后浪”，就算是换一种“后浪”，照样翻车。在某些时候，消遣和解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性，拿什么都不当回事，看起来好像挺消极、挺傻缺的，但这就是眼目下最有效的抵抗方式。当然，只是在某些时候，当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扮演某个角色时，或许是职业上的，或许是身份上的，我们就迅速放弃了那种消极的抵抗，融入到了旧有的秩序中，我看你有一条笔记谈到：“秩序在收割一切，收割一切可能对秩序造成威胁的各种力量，青年、新人就是这样一种具备某种潜在威胁的虚构性力量，一种正在被秩序改造并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我是觉得，未必是秩序在收割青年，更有可能是青年在利用秩序，能够带来利益的秩序，我们维护它，不能带来利益的秩序，我们嘲弄它，这是跟上一代人很大的一个区别，对上一代人来说，秩序除了意味着利益，还意味着牺牲。

何同彬：消遣、解构、嘲弄、无厘头，包括B站的鬼畜文化，这种试图颠覆固有秩序的亚文化手段从文化属性上来看由来已久，西方就不说了，你们的前浪“70后”“80后”，甚至更早的“60后”有一批人也曾经以为据此可以造成旧的文化瓦解，并建构新的文化，但很显然，他们在获得局部快感、局部修正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秩序还是原有的秩序。作为90后你认为可以在“不牺牲”的情况下“利用秩序”，这样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上？

周恺：“局部快感”这个词很准确，而且结果多半也是你说的“秩序还是原有的秩序”。我只是在说一个现象，不带是非判断，90年代末，2000年初，甚